

何微的新闻思想与新闻教育思想

车 英

何微是我国当代著名报人、新闻学家和新闻教育家。他在党的新闻战线和新闻教育战线上征战了半个多世纪,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新闻思想和新闻教育思想。本文详实地阐述了何微新闻思想的主要内容,即新闻的党性、真实性、舆论监督、价值观、中国新闻思想发展史观、新闻学研究内容建构等;较全面地论述了何微新闻教育思想及其实践,指出:我国新闻教育应面向未来,抓好“名师”的培养工作,以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的标准要求新闻专业的学生,建立与现代化新闻教育相配套的新闻研究机构和设施。文章强调指出:何微的新闻思想和新闻教育思想是我们党和国家无产阶级新闻思想和新闻教育思想的组成部分,是我们党和国家新闻学宝库中的宝贵财富。

何微教授是我国当代著名报人、新闻学家和新闻教育家。半个多世纪以来,何微南北转战,为我国新闻事业的繁荣与壮大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和卓越的贡献。在战争年代,他亲赴前线,冒着枪林弹雨,在和平环境中,他深入基层,体察民情,写下了许许多多影响深远的篇章。在漫长的记者生涯和新闻教育生涯中,何微认真学习,勇于探索,形成了自己的新闻思想和新闻教育思想。总结和研究何微征战半个多世纪的光辉历程和他的新闻思想及新闻教育思想,对于弘扬我国优秀新闻传统、激励后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何微征战半个多世纪的新闻生涯

何微,初名何畏,笔名米若、石冷,1916年7月23日出生于我国华北西南部的山西省祁县一个中医世家。何畏天性好学、聪明伶俐,少时就能通读《四书》、《五经》。1930年他14岁祁县中学未毕业就考取了太原师范,之后又抱着“教育救国”的信念中途弃学从教,当上了建安村两级小学的校长。因早年家藏《时务报》、《申报》、《京报》等,使他养成了爱读报的习惯,从中受到了一些新闻思想的启迪。

1937年,日寇的铁蹄已践踏了中国的东三省,并开始对华北乃至全中国虎视眈眈。当年

2月，年近21岁的何畏毅然投笔从戎，加入了“山西抗日牺牲同盟会”，成为该会决死队（又称“山西新军军士二团”）的一员。在军营里，他听过周恩来将军所做的题为《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的报告，感慨万分，发誓要抗日到底。之后他被调入决死队政治部工作，在该政治部主任李力果（延安著名民主人士李鼎铭先生之子）手下，一人编写油印小报——《广播台》，向士兵们传播爱国抗日思想，从此便与新闻结缘。

1938年10月，何畏应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宣传部工作的同学孔敏之邀，徒步渡黄河赴抗大求学深造。在抗大，他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军事科学，多次聆听毛主席等中央首长的教诲，从而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更名何微，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中一名永无止境的真理探索者和捍卫真理的坚强战士。

1939年抗大毕业，他被分配到太南特委工作。年届23岁的何微同志，在当县长与当记者的职务选择上，毅然地选择了记者，赴任《黄河日报》国际新闻编辑（该报国内新闻编辑为白浪——前任北京市副市长白介夫，王春——解放后曾任《工人日报》总编辑，副刊《山地》编辑为后来名骚中华的著名作家赵树理。何微兼任该报社党支部书记），从此正式步入新闻界，并且一干就是50多个春秋。

何微1940年任太南《人民报》记者、《光明》杂志编委。是时，何微临危受命，以青年记者协会太南分会代表的身份，前往国民党新五军孙殿英（后为“东陵大盗”、投降日寇的汉奸）部，直接会见这个土匪出身的军长孙殿英，并且深入河南安阳核查了该部抢劫扰民的事实真相；1941年任《太南导报》社长、新华通讯社晋冀豫分社社长；1942年9月任《晋豫日报》社长；1943年到太岳区工作，任区文委书记、新华社太岳分社副社长兼总编辑等职务。抗战胜利后不久，何微前往山西临汾采访陈赓将军同阎锡山的代表王靖国（国民党第61军军长）“和平谈判”的情况。“和谈”进行了一个多月，何微先后发出了40余篇消息和通讯报道；1947年何微作为新华社战地记者，1948年调任华北《人民日报》记者，先后赴运城和太原前线，跟随王震将军和王新亭将军，冒着枪林弹雨，在前沿阵地上进行实地采访。在战壕里，在敌人炸过的炮弹坑中，他写下了许多篇可歌可泣的战地新闻，受到上级的通报表彰；1949年太原解放在即，何微在战火纷飞的太原城外就任《山西日报》社副社长兼任新华社太原分社副社长，主持分社工作。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依靠工人阶级，在人民解放军攻克太原城后的第三天就领导出版了第一期革命的《山西日报》。

全国解放后，何微的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1950年1月，何微奉调担任新华通讯社山西分社社长；1952年就任新华通讯社华北总分社副社长兼任北京分社社长，于1954年12月——1955年3月底，他随新华通讯社代表团赴苏联学习并访问塔斯社；1956年10月调任江苏分社社长；1962年任西北政法学院副院长，组建了我国西部地区第一个新闻系；1974年任《陕西日报》总编辑，期间曾率中国记者协会代表团赴罗马尼亚考察地方新闻事业；1982——1984年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新闻研究所所长、陕西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陕西省考古学会会长等；1984——1992年在武汉大学新闻系任教，创办新闻学研究所并首任所长；1992年回陕工作，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陕西省委党校兼职教授、全国新闻教育学会顾问等。在百忙的工作和研究之余，何微教授仍在挤时间学习新的知识、掌握新的技术，并深入研究先秦文史巨著，每天都用上一两个小时坐在自己购买的“486型”微机前学习“五笔字型”打字法。

为革命奔波大半生的何微,不管是在如火如荼的峥嵘岁月,还是在建国之后艰苦创业的和平环境中,即使在执鞭任教、著书立说的今日,一直保持着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老一代革命报人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堪称一代楷模。

二、何微新闻思想的形成与分类

何微教授从事新闻学理论的研究工作,可以追溯到1946年他任新华通讯社太岳分社副社长之时。当时太岳分社调入了一大批年轻同志,何微以他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阔胸怀和新闻记者本能的敏捷洞察力,预感到新中国的诞生指日可待。他意识到,随着全中国的解放和新中国的建立,新闻事业定会有个大发展,新闻记者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上均应有个大提高。于是,他提出了新闻记者在进行日常采编的同时也要从事新闻学理论的研究工作,并号召年轻记者应成为政治思想上过硬、理论联系实际、一专多能的新闻工作者。何微社长认真指导、言传身教并身先士卒、身体力行,写出了多篇新闻学术文章。他写的论文《爱国自卫战争军事报道研究》,就是他当时的新闻理论研究的代表作之一。

在何微任新华通讯社华北总分社副社长兼任北京分社社长之时,他在工作之余写了大量的新闻学研究论文,1956年10月15日中国人民大学创办了《新闻与出版》报,该创刊号开辟的“新闻讲座”专栏就是以何微的《新闻导语》为开篇的。

何微不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建设时期,乃至在“极左”时期被发配住进“牛棚”所度过的那些岁月里,他一直未放弃新闻学术研究。至今,他发表了80余篇影响颇大的新闻学研究论文,约达70万字,其中大多数论文都在《中国新闻年鉴》、《新华文摘》等报刊上转载和摘登。何微教授所著《新闻科学纲要》是一部总结党的新闻工作传统的专著。

纵观何微教授的新闻思想,笔者认为可大体分为6个方面:

1. 关于社会主义新闻的党性原则思想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共和国。作为党和人民的舆论工具和喉舌,我国的新闻事业必须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党性原则,这是何微同志在新闻理论研究与采编实践中历来坚持的原则思想,尤其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何微更坚定了这一思想。

何微认为:“报纸的性质是报纸理论的根本问题,也是长期争论的焦点。但是,实践证明不管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没有真正解决。”如在我们的报纸上,还有“不顾党和国家的利益,以资产阶级报纸抢独家新闻的手段任意泄露国家机密”;“有的对党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任意散播不满和反对意见”;“有的对天下大事竟然背离中央方针,发表‘独立’的见解”等等。1980年5月,何微在西北五省新闻工作会议上指出:报纸是有鲜明的阶级性的,社会主义的报纸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喉舌”和“工具”,其本质特点有三:一、报纸是阶级的舆论工具,担负着引导社会舆论的重任;二、报纸主要是通过新闻报道直接反映当前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重大事件;三、报纸有着极大的广泛性和群众性。他尖锐地指出:“报纸的实践证明,在阶级社会里,报纸始终是阶级的舆论工具。因此,对于报纸的性质,任何无视阶级性的提法都是不妥当的,严格说是错误的。”在谈到新闻纪律时,何微坚决地说:“无产阶级的舆论工具要有严明的纪律,不允许自由行动、自由言论,……如果有的报纸允许自己的编辑

记者完全按照个人意志自由言论、自由行动，那就不是一张社会主义的报纸。……党报党刊一定要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两个月后，何微的这篇发言，经稍加整理以《关于报纸的性质》为题发表在《新闻研究》创刊号上。这篇论文的发表，对于当时那些趁改革之机搞自由化和要把“西单墙”搬入党报的人来讲，恰似挨了一枚“重型炸弹”，而对于陕西、西北地区乃至全国办报继续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办报思想和坚持新闻的党性原则，其影响是深刻的。

2. 关于社会主义新闻的真实性原则思想

在新闻学理论研究中，何微同志非常重视真实性原则问题。他认为：“新闻学是同自然科学一样精确的科学，新闻的真实性在新闻科学中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谁违背了新闻的真实性，那就不成其为新闻事业”。因此，在进行新闻学理论研究中，新闻学研究工作者也应象自然科学工作者那样一丝不苟、严谨治学。

对于新闻真实性问题，他在《新闻的真实性》一文中进行了全面详尽的论述。他指出：社会主义新闻工作者的职责是真实地描述客观事物，将真象告诉大众，不论在任何情况下，决不容许借口任何理由违反“按照事实去描写事实”的原则。新闻的真实则“必须与原客观实际相符合，不容包含丝毫主观随意性。”何微又指出：新闻真实性原则的最大敌人是失实，而这个问题是个“需要长期对待的问题”，不能采取突击打歼灭战的办法。他列举了四个理由：一是新闻报道失实不仅仅是新闻单位一家的事情，而是一个带有社会性的问题，有时还带有某些不正常的政治色彩；二是对新闻真实性原则问题尚缺乏完整系统的研究；三是在我国新闻队伍中，有不少人“并未经过严格的新闻理论和新闻伦理学的训练”，文风不正，缺乏新闻职业道德观念；四是我国尚“缺少一部新闻法，用于保障新闻真实性原则免受侵犯”。因此，他四处呼吁、再三强调：“坚持新闻真实性，还须长期不懈的努力”。

3. 关于我国新闻的舆论监督思想

何微教授认为：舆论属于一种社会现象，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他在分析研究了舆论的形成过程后指出：舆论应具有五种特征，一是具有不特定多数性（或称公众性）；二是具有目标的一致性（或称集中性）；三是具有愿望的接近性；四是具有时间的持续性；五是舆论的发生、扩张到收到成效有个过程。同时他又指出：“舆论既反映民意，也反映统治阶级的意志”，“现在，还有一些人很害怕舆论揭穿问题的老底，故加予舆论种种限制，或‘围剿’切中时弊而语言尖锐的舆论。”何微认为有四点值得新闻工作者注意：一、能左右客观形势的舆论，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应认为是正确的舆论，但也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二、舆论是多样的、复杂的，要充分认识舆论一律的相对性和舆论不一律的绝对性，应遵循党的原则合理地反映舆论的一律与不一律；三、舆论有正确与不正确之分，因此不能忽视少数人的舆论；四、舆论常常受到某种无形的压力，新闻记者应善于明辨是非，排除干扰，正确引导舆论。新闻事业单位要把比较分析舆论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内容，经常倾听和主动收集各种舆情，研究舆论的产生原因、背景、变化和归宿，对已存在的舆论进行评价，将其引导到正确的方向，发挥舆论的影响、调节、监督功能，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

何微关于新闻的舆论监督思想，不仅仅是要求运用舆论进行批评，而且还要运用舆论对新事物、优秀人物进行支持、推广和宣扬。何微重申：新闻是讲阶级性的，新闻媒介是为人民行使舆论监督权利服务的，新闻传播事业掌握着舆论工具，但任何人、任何集团都不可滥用舆论；新闻媒介所发表的舆论“不可抵触国家的根本大法、不可违背社会主义基本原则。”

4. 关于无产阶级新闻的价值观思想

何微认为:新闻价值是新闻学中的核心问题,是构成新闻的事实本身具有的、能够满足社会对新闻需要的素质的总称。新闻有无价值,主要看新闻所报道的事实有无价值。何微教授总结了我党多年来新闻工作的实践经验,提出了“要突出时代性、现实性,按照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主要以正面报道最具新闻价值”的思想;但对于有些与人民生活有密切联系的、属于揭露批评式的报道,“同样是具有新闻价值的。”

何微提出,在确保其报道绝对真实的基础上,可从两种视角观察其新闻价值。在宏观上,可从五个主要方面判定:1. 及时;2. 简洁;3. 新鲜;4. 实用;5. 符合党的宣传政策。从微观上看,何老认为至少可从十个方面判定:一新——新鲜;二真——真实;三近——接近;四要——重要;五味——趣味;六快——时效;七短——简洁;八精——精练;九活——生动;十深——深刻。以上两类判定应有主次,何微教授认为:应首先从五种宏观方面判定一条新闻是否具有新闻价值及其有多大的新闻价值,因为这是一个方向问题。

5. 关于中国新闻思想发展史观的思想

我国新闻的产生有悠久的历史,和古代纪事文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也有其自身演变和发展过程。但目前我国只有新闻事业发展史,而且基本上只有三条发展主线:一是以中国报学史为主线;二是以新闻界人物传略为主线;三是以新闻事业专业史为主线。但何微认为,“还有一条不可缺少的主线,即中国新闻思想发展史,由此接触我们从未深入研究的科学领域,又可指导新闻史研究的门径,对悠久的新闻思想发展成果进行初步的总结。”

何微教授在《武汉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上刊文《关于中国古代新闻思想发展研究》,对先秦时期的我国古代新闻思想发展进行了颇为深入的研究,第一次提出“自有人类以来,就产生了新闻思想和新闻传播活动,而且人类的新闻传播活动从未停止过,它是由低级到高级发展,受到新闻思想的支配”;第一次科学地论证了二三百万年前即新生代第四纪更新世时期人类已有新闻思想和新闻活动等重大问题;第一次提出“在三千年前,关于新闻记述的要求和思想已基本形成”;第一次提出了《春秋左氏传》是我国第一部新闻作品选集,之后又撰文更全面详实地对此进行论证。

的确,中国新闻思想发展史要比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史更为久远、更为斑斓、更为宏伟、更为丰富。何微教授辛勤笔耕,完成了约500万字的《中国新闻思想发展研究文集》巨编和专论,较为完整地勾划出了自远古时代到现代的我国新闻思想发展的大致脉络,添补了这一新闻学研究领域的空白。

6. 关于新闻学研究内容的建构思想

何微教授认为:在新闻学研究中,一定要有求实的气度、发展的眼光、求精的功力、严谨的情操,四者缺一不可。“求精”与“严谨”是具体可见的工作作风,而“求实”与“发展”确是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因此,何微在维持传统的三大块即新闻理论、新闻史、新闻业务的基础上,根据时代的特点,提出了侧重于未来发展的新闻学研究内容的建构思想:一是新闻管理学,因为它是“一门横跨于多种学科之间的综合性学科”,是“带有决定我国新闻事业是先进还是落后的一门关键性学科”;二是新闻人才学,这也关系到我国新闻事业后继有人还是后继乏人的大问题;三是微电子新闻学,这是时代的要求,又是先进的科学技术浸透于新闻学中之必然;四是对新闻学与大众传播学的比较研究;五是研究中国新闻思想发展史。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新的学科也要研究，如新闻信息学、新闻心理学等，但应把主要精力放在上述五种研究之中。实际上这些也是何微新闻教育思想的组成部分。何微先生一直按照自己的这一构思进行着颇有成效的研究工作。

三、何微新闻教育思想及其实践

何微教授在武汉大学任教的八年，是他新闻教育思想成熟和实践的八年。

然而在武汉大学，一提起何微教授的名字，不少人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何微，何为此？偌大的年龄，偌高的资格，偌深的学识，偌长的经历，离开夫人来到武汉大学当个小小的新闻学研究所的所长，何苦来着？

每当听到这类问题，他总是这样回答道：“我来武汉大学，一不为官，二不为名，三不为利！我为的是把武汉大学新闻系办成全国第一流的新闻系，为的是把我们的学生个个都培养成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合格新闻人才。”以笔者肤浅之管见，何老的以上所言（笔者归纳为何微的“两为三不为”），实际上就是他新闻教育思想的精髓所在。

其实，何老之“办好新闻教育”和“培养出合格新闻人才”是他早已付诸实践的思想。前述之新闻思想也是何微新闻教育思想的组成部分。早在1954年至1956年他任新华通讯社北京分社副社长之时（甚至还可以追溯到1946年他任太岳分社副社长之时，本文前面已做了阐述，其新闻教育思想就已成雏形），他就为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青年报》开办的新闻训练班开设过“新闻采访与写作”课程（任课教师还有吴玉章、徐特立、田家英、郑振铎、华山、叶圣陶、魏巍、丁玲、赵树理、刘白羽等），1962年他调任西北政法学院副院长，领导创办了我国西部第一个新闻系。

1983年，何老重操旧业，继续对新闻教育学进行研究。他总结了以往新闻教育中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提出了《面向未来改革新闻教育》。他在文中指出：新闻教育应面向未来，要根据时代的要求和特点，在课程设置上，应增加一些“有新内容、能适应未来需要”的课程，如新闻管理学、微电子新闻学、比较新闻学、中国新闻思想发展史学等。

要办好新闻教育，何微认为，其首要关键在于抓好师资力量的培养工作，需要一批“名师”，进而促使“名师出高徒”。关于师资培养问题，他指出应在确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的基础上，大力补充新的知识，“由于学科间的互相渗透和结合”，新闻学专业教师原有的“知识结构远远不能适应这种新趋势，因为老知识培养不出能够适应未来的新闻人才。”

办好新闻教育的第二个关键就是抓好新闻专业学生的培养，这是“面向未来改革新闻教育”之目的所在，对此，何微大体归纳有二：“一、培养学生具有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的创造精神和综合性判断能力；二、学习成绩卓著，知识直接接近现代化要求，将来能成为促进新闻事业发展的领导力量。”在此基础上，何微进一步提出：“我们应以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的标准要求新闻专业的学生。今后新闻专业的毕业生要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素质，有驾驭全局的能力，思想敏捷，知识储备充足，写作技能娴熟，能直接阅读外文报刊”等等。

自何微进入武汉大学任教之后，由于更直接地接触了教学实际，从而使其新闻教育思想有了一次较大的飞跃和进一步的深化。1984年9月何老初入武汉大学，就在学校党政领导和教务、人事、设备、科研等处处长及新闻系负责人一起参加的联席会议上提出了四点“办好

新闻教育”的思想(即四点意见):一是要花大气力把武汉大学新闻系办成全国第一流的新闻系,坚决按照新闻教育规律进行教学,坚决反对仅满足于开上几门课或新设某些专业这种疲沓沓的“维持会”作风;二是提出新闻系学生实行“双学位”制,尽快培养出一专多能的合格新闻人才(何微教授是在中国地域内第一个从理论上阐述新闻教育采用“双学位”制之人——笔者注),在这次会议上,何老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法新社要求它的记者至少具有两个学士学位,至少懂得两门外国语。何微并指出:做新闻工作,知识面太窄是没有好处的!我们新办新闻系更应办出自己的特色来。新闻系可先在正常招生的同时,在全校范围内招考学生攻读新闻学第二学士学位,充分发挥武汉大学学科齐全、实力雄厚的优势,一旦时机成熟则立即增设更高层次的“双学位”制,以适应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需求;三是新闻学研究应面向未来,新闻教育更应面向未来。因此,在对新闻学原有三大块进行研究与教学的同时,应建立几门新闻学的新学科,如新闻管理学、比较新闻传播学,尤其应重视微电子新闻学的研究与教学;四是要在新闻学研究所建立新闻文献资料分析与检索系统,建立图书管理、资料管理、电脑数据、信息传播研究四结合的智据科学,运用电传及计算机进行信息储存、分析与检索,成为与现代化新闻教育相配套的新闻学研究机构。

何微教授的这四点办好新闻教育的思想当即受到与会各位领导同志的赞许。十多年来,何老的新闻教育思想,尽管历经了风风雨雨,而如今在武汉大学新闻学院这块“实验田”里正在逐步地实现着。

四、简单结语

何微是一位老者,但在他的身上却充满着青年人的蓬勃朝气;他是一位老革命,但他不居功自傲,始终把自己作为党的一分子,长期保持着抗大的优良传统和学风;他是一位老新闻工作者和新闻学理论研究工作,成果累累,但他仍旧永无止境地知识的海洋里遨游,而且从不愿让人称他为“家”;他曾是一位身居高位的领导同志,但他平易近人,甘为人梯,是一切追求真理、勇于探索者的可靠朋友。何微教授历经了战争年代和和平建设时期及动乱岁月和改革开放。历史证明,何微是最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和最优秀的革命报人之一,他的新闻思想和新闻教育思想是我们党和国家新闻思想和新闻教育思想的组成部分,是我们党和国家新闻学宝库中的宝贵财富。在我们尊敬的何老80华诞之际,衷心祝愿他老人家健康长寿,在新闻学理论的研究和新闻教育中,不断探索,勇于出新,为完善与发展我国的无产阶级新闻学理论和新闻教育事业再做新贡献。

补记:在何微教授80华诞之际,武汉大学校长、著名哲学家陶德麟教授诗赠何微教授,诗曰:鸿文掷地有金声,笔走龙蛇几度春;百战征袍终不卸,黉宫挥麾育新军。并附言:何微同志早岁献身党的新闻事业,建树甚丰;晚年在武汉大学新闻学系执教,擘画之功亦钜。值何老八旬华诞之际,书此为颂。

(责任编辑 叶娟丽)